

作家
在线



人物名片:

黄荭,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拥有中法双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翻译工作。其学术成果包括《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分析》,主持完成多项省部级及国家级社科项目,出版《杜拉斯与亚洲》《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等专著。作为资深翻译家,她翻译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等60余部法国文学作品,并担任圣艾克絮佩里作品全集主编。

译作获得第十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项

黄荭:无事花草 闲来翻书

“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不仅是对我的译作《每个人》的肯定,更是我30年来热爱法国文学、坚持文学翻译的最好见证。”在获得第十七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项后,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这样说。

《每个人》译自法国2019年龚古尔奖获奖作品,法语原版书的书名为《并非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栖居于世》,直译是“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方式都不同”,这是主人公保罗的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可以译得更像谚语:“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

黄荭最初是被法语书名吸引,之后是那个动人的关于已逝幸福的怀旧故事。“正如潘多拉魔盒的隐喻,作者让一保罗·杜波瓦在冷静而反讽地揭示世界的残酷与荒诞之后,仍为我们保留了一缕希望与温情的微光。”中文译名《每个人》更简洁、更含蓄,更容易让每个读者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共鸣。

从文学爱好者到杜拉斯研究专家

作为苏教版、作家版、译林版和立体书《小王子》的中文译者,黄荭从小对阅读兴趣就很广泛,属于见到什么书都会随手拿起来翻翻的那种。“毕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浙西南群山环绕的小镇上,书籍对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还是某种精神上的奢侈品。”

黄荭说她的父亲就爱读书,印象中他曾连续几年订一本外国文学杂志。当时她还在上小学,那种囫圇吞枣的阅读应该算是外国文学对她最早的启蒙。中学时,黄荭分别办了小镇图书馆、父母工厂工会图书室以及自己学校图书馆的借书证,什么书都看。上大学之前,她对外国文学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法国文学名著的中文译本也读得不少。

报考南京大学法语系时,黄荭和多数同学一样并不很清楚学校和专业的具体排名,就是一心想要考上重点大学,再加上喜欢法国文学。但大一时,主要课程是基础语言知识和法国概况,黄荭觉得颇为枯燥无味。她形容当时的失望:“就好像本来做好了拥抱整个法国文学无比丰盈的世界,结果却只塞给我一本干巴巴的法语入门书。”她因此甚至有一段期间产生了厌学情绪,“主要是受不了都德所说的最美的语言下那套复杂的语法体系,额外的情况比规则还多,尽管规则就已经是一套又一套的了。”

直到二年级的课程中渐渐增加了文学内容,黄荭才逐渐对所学专业有了兴趣和热情。再之后,热情越来越高,她顺势走上了从小就梦想的文学道路。“不过在文学的前面多了一个形容词‘法语’,在文学的后面还拖着一个‘翻译’的尾巴。”黄荭笑着说。

黄荭是杜拉斯研究专家,她的博士论文做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杜拉斯的东方情结,另一部分是杜拉斯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这么多年下来,杜拉斯早已占据了黄荭书房的整整一个书架,她对她的研究还一直在继续。她牵头翻译了大部头的研究著作《解读杜拉斯》,译过她的传记《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杜拉斯和媒体的访谈《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甚至还有一个加拿大粉丝致敬她的法国偶像的《写给杜拉斯的信》,2014年杜拉斯百年诞辰的时候她出了一本文集《杜拉斯的小音乐》,2024年增加了新的内容更名为《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

谈到自己对杜拉斯的兴趣,黄荭说源自1997年夏天本科刚毕业时,“当时蒙许钧老师推荐,和袁筱一一起为漓江出版社翻译《杜拉斯小丛书》中的《外面的世界》。或许是‘外面的世界’让我看到杜拉斯的很多触角,或许是她打开的无限可能性和她作为知识分子的姿态吸引了我,之后的研究,是自然而然的。”

谈到被国人广泛关注的杜拉斯的小说《情人》,黄荭认为在这部作品的身上可以明显看出杜拉斯作品通俗化的一种倾向,这也是这本书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拥有大量读者和拥趸的原因。“但在一个畅销书——用杜拉斯自己的话说是‘车站小说’——

的外表下,《情人》其实是一本很好的探索写作和内心的书,是印度支那系列《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天上树的日子》《伊甸影院》和印度系列《劳儿之劫》《副领事》《印度之歌》的内容和风格的延续。杜拉斯的作品之间,作品和她本人的生活之间都有很强的互文关系,我觉得《情人》是这种互文网络中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被称为“最会生活的翻译家” 做翻译像栽培植物

黄荭被朋友们称为“最会生活的翻译家”,她也形容自己的生活是“无事花草,闲来翻书”。花草对于黄荭来说,和阅读、写作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名字‘荭’就是植物,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说的‘此蓼甚大而花亦繁红,故曰荭,曰荭,曰荭亦大也。’”

黄荭家有一个露台,她精心养护的花花草草在这里迎接朝晨日暮。最多时能结200多个果子的柠檬树已经陪她十几年了,还有玫瑰、绣球、爬山虎、络石、野蔷薇等等。

黄荭的“花缘”极好。有一株朋友送的芦荟,本来担心过冬养不活,结果第二年朋友的芦荟香消玉殒,她的却在春暖花开时长了好几盆。每年她都会从花市买各种花草,她认为“花儿是转瞬即逝的”,所以不要有“养不好”的思想包袱,“因为总有一些植物会水土不服,就像总有一些书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所以不必纠结。”

“花为媒”,黄荭因花草结识了许多同好,大家经常线上线下交流自家花园露台的消息。“我们也经常互相赠送花草,你给我木荷蒿,我还送你迷迭香,就像你出了一本诗集送我,我译了一本小小说赠你。”

黄荭曾翻译过科莱特的《花事》,中文首版里面的每一张插图都是手工贴上去的。她说:“最美的花就是亲手栽种的,因为它在它身上倾注了时间。2024年年初,我的老朋友陈卫新在小西湖堆草巷设计了一家书店,书店做的第一场活动就是《花事》——小巷里的森林。”因为《花事》,我也认识了厦门酷爱花草的作家苏西、书评人沈胜衣。其实不仅是通过书,植物也是,我身边喜欢植物的朋友很多,我家里很多植物就是亲戚朋友送的。你家的植物来了我家,我的植物去了你家,就跟翻译一样,如果没有翻译的话,很多语言死了就死了。文学湮灭了就湮灭了,但是因为有了翻译,在这里消隐的文本因为流转到别处在别处生了根,延续下来发扬光大了。”

黄荭形容做翻译像栽培植物,可能会让一本书重焕生机。“有的书,比如《小王子》,用毕飞宇的话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但像这样老少咸宜的书还是难得一见的。也有一些书在原来的文化语境中已经不再被关注了,可能去到新的土壤里能收获新的读者群,产生神奇的化学反应。”黄荭回忆起大四的时候,曾经翻译过一些罗曼·罗兰的作品,她说罗曼·罗兰跟中国的相遇就是很奇妙的,“二战之后,他在法国渐渐被淡忘,但是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跟中国新文学相遇开始,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再度进入中国人的阅读视野,先后激励了几代人。我书房里还有读中学时

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当初读就觉得很有志气,很澎湃,专门包了牛皮纸封面,几次搬家都一直留在身边。”

黄荭的家里充满屋子的法国文学书籍和《小王子》的周边。她的朋友们知道她喜爱《小王子》,总是会带给她世界各地与《小王子》有关的东西,她也乐于与人分享这些书籍和周边的来历。”

与马振骋先生的交往 傅雷翻译出版奖创立于2009年,是国内翻译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以纪念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而得名。此前,已有多位南京大学法语系毕业生的译著入围并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体现了南大法语系在翻译实践、翻译研究与翻译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良传统,及其在中法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2025年11月17日安祥辞世的知名法语翻译家马振骋先生不仅是南京大学外语系首期法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还是第一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得主,获奖作品是他用十年时间潜心打磨的三卷本《蒙田随笔全集》。

黄荭是2008年认识马振骋先生的,“因为家中收藏的最早的一本签名本是他的《我眼中残缺的法兰西》(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何家伟特约编辑)。他在自序的开篇提到《东方早报》记者石剑锋对他的一篇采访中,说‘马振骋为法国文学而生’,他换了两个字,改成‘马振骋以法国文学为生’,说‘这才更符合实际’,这既是马老师的自谦,也是他的幽默和机智。”

因为都热爱法国文学,都翻译过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和杜拉斯的作品,都喜欢美食、花草和艺术,马振骋成了黄荭拜访次数最多的老一辈翻译家。“每次我去上海出差,若得半日清闲,就和张玉贞、林岚、段晓楣、刘芳、袁筱一等友朋三三两两相约去看望他。坐在他家19楼毫无遮挡、视野开阔的客厅,有一种‘高在上’的自在从容,就着上好的咖啡或红茶,几盏精致的小点和糖果,围坐聊文学和艺术,聊作家和做人,聊日常和八卦。”那时候70多岁的马老师还经常骑自行车出门,乐于参加各种读书会和文化活动,打扮得很绅士,待人接物更绅士,温文尔雅,冷不丁冒出一两句金句,举座皆欢。

黄荭最后一次见马振骋是2024年夏天,“那时他已经步履蹒跚,不再下楼,说脑袋多数时间昏昏沉沉的,容易疲累。”知道黄荭和张玉贞来,马先生身上显然找到了某种深切的契合。这本传记不少地方他用不同颜色画了线,有的句子尝试做了翻译,有几处标注了相关参考文献的页码。还有几处他在页边上写下了阅读体会,未尝不是他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比如:人只有在孤独中才找到自己,找



到大写的‘人’,找到与人的联系;又比如:怀旧,莫名怀念比当年年轻的东西,剔除过去中一切不幸,负面的东西也成了愉快的回忆。”

面对语言平庸化的潮流 我们绝不能沦陷

作为一名女性,黄荭自然对女作家、女性书写更加敏感,能够产生更多心灵上的契合和共鸣。“像《花事》的作者科莱特,她给我更大的启迪就是对自由的向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好书,甚至一本好书带给你真的不只是消遣了几个小时。”在黄荭看来,看一本书,如果真正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它的养分,那就像植物吸收了阳光和水分,“阅读其实就像植物的生长,人需要阅读的。”

从事翻译工作多年,黄荭对翻译的认识和翻译风格也有变化。“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文字优美的文学,翻译的时候也会尽量去追求文字上的漂亮。但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对文学的理解更加多元化,在翻译的过程中就会尝试更多的风格。觉得某种程度上,直白朴素的语言,会更加打动读者。”

老一辈翻译家对年轻一辈翻译家有所批评,认为有的译者语言拖沓啰嗦,对此,黄荭认为:“老一辈翻译家往往具备古功底,语言更加简洁凝练,而自媒体时代和快餐文化把整个社会的语言水平都拉低了,写作、出版、发表的门槛越来越低。虽然我们正是在经历一个文学和语言平庸化的时代,但以文字为生,甚至以文字为使命的作家和译者应该对语言和风格有所追求,因为如果我们都沦陷了,连文学都沦陷了,我们要去哪里寻找诗意的栖居呢?”同时,黄荭也强调:“古文能力是语言训练的一个方面,多读古今中的经典,对一个人语言和风格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

在黄荭心中,阅读经典是一种回望,回望曾经有什么,才知道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或者说看到以前的高峰在哪里,才会知道现在的低谷在哪里。她也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阅读经验定格了她对人对事、对生活的看法,“而我居然也在别人的故事和文字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书。说到底我只是一个跟在作者身后亦步亦趋的读者;作者创造,我再创造;作者思想,我再思想。自以为是我‘注六经’,殊不知是‘六经注我’。”黄荭说,“我努力让自己学会谦卑,对所读的每一本好书和坏书都心存感激。”

教书之余,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黄荭仿佛永远在忙。目前,她正在对法国女性出版社联合创始人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孕育》进行校稿。另外,也即将翻译加缪的《第一个人》和纪德的《窄门》。

每当书读累了,翻译倦了,黄荭就会走出书房“浅草居”,去露台上透透气,修剪修剪花草,她说:“那是我B612小行星。”

王勉

没有养老规划 想做的事很多 八十四岁冯骥才新年出新书



84岁的冯骥才又出新书了。“新年·新书·五大道——冯骥才、赵晋《清流:五大道生活》分享对谈”近日举行,冯骥才先生带着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畅谈书中所书写的五大道过往岁月,品味天津文化,向读者分享这部新作的魅力与价值。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以下简称《清流》)是冯骥才先生继《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这套记述五十年文化人生的作品之后,回溯自己生命长河源头的新作。他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详述家族的往昔点滴、情感故事,个人的求学、谋生、恋爱经历、亲友往来趣事等,而在他个人和家庭跌宕起伏的故事背后,天津五大道地区独特的文化韵味与历史内涵也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五大道是一座文化富矿 人生清流始于此

面对满场的观众,冯骥才娓娓道来他与五大道的深厚缘分。他形容五大道“是一座富矿”,他的人生清流正是始于五大道。

在冯骥才看来,虽然跟自己年轻时比起来,五大道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它的历史、内涵和记忆还留着,可以挖掘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这里的建筑,与按照标准的西式建筑盖起的解放路不同,来五大道定居的政要商贾,拿着各式各样的图纸,把这里变成了“建筑的试验场”,“人们可能把罗马柱搁在平台上,把亭子搁在房顶上,把天津的砖雕搁在洋房里,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创造性。”冯骥才惟妙惟肖地描述着那些充满活力的老建筑,“这里马路不宽,尺度宜人,两边是树,墙比矮,跟房子子的风格是一致的,院子里面是一层树,再里面是半隐半现的房子,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体现那个动乱的时代人们对安全的需求,但又很优美。”

作为一个在租界区里长大的孩子,冯骥才反而对老城充满了文化兴趣。正如他在《清流》中所写:“对于我,天津有另一种很特殊的魅力,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形象与气质,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分享对谈中,冯骥才进一步阐述了天津城市的独特性,在于以码头文化为起源、说天津话的老城和以西洋文化为主、说国语的租界区,两个城区虽然社会结构和生活文化截然不同,但并不分裂对立,而是融合的,共同体现了天津人开放包容的本质。

充满乐趣的写作曾中断 时代使命更重要

天津这座城市究竟给冯骥才先生带来哪些丰厚的文学营养?冯骥才回答,所有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那些熟悉的事物带给自己心灵的撞击和丰富、深刻的感受。让他感受最深的,便是独特的天津人。

“在码头上,没有能耐你活不了。我这一辈子从小听到大听到天津各式各样的奇事太多了,认识这样的有绝活、有本事的人太多了,我写的小说远远没有把我知道的全都写进去。”冯骥才形容,这些人物的直往他笔杆里钻,写作时一个“挤眉弄眼、鲜活乱跳”地自己往外冒,而这样的写作当然也是充满乐趣的。

但充满乐趣的小说创作也曾一度中断。冯骥才告诉在场观众,因为他挚爱的天津,在上世纪90年代城市大拆大建的浪潮中,面临文化遗产生死存亡的危机。从那时起,他就投身跃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漩涡里”,不仅关注天津的城市历史,更关注中国大地上所有的民间文化,“我们应该主动承担,我觉得这是作为文化人、作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而且绕不过去的一个时代的使命,所以就把手放下了,那比我个人写作重要。”

脚踏实地努力生活 至暗时刻都会过去

84岁的冯骥才先生即将迎来人生的第七个本命年。谈到新的一年,他说自己没有养老的规划,因为想做的事情还很多,“一是刚刚落成的博物馆需要做得更精,做得更好;二是非遗学科建设,包括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搭建,还要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培养更多人才。我现在把画画放下了,因为事太多。但是写作没有放下。”他透露,自己新写了一篇小说《会吃》,讲天津人吃鱼的本事,但离新一部《俗世奇人》文稿还需要一些时间,“我也不知道哪天,反正我不会停了就是。”

面对读者“度过生命中至暗时刻有什么秘诀”的提问,冯骥才回答:“谁的人生没有至暗时刻呢?人生就是这样,酸甜苦辣,什么都要经历。我结婚时的房子才七八平方米,经过十年的努力好像有了一个像样的小家,唐山大地震把我家整个‘覆灭’,我们一家人在楼梯上挖了洞钻出来。一个朋友收留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年。”他说,无论住在哪里,家里的墙上都挂着画,“因为我和我爱人都会画画,都热爱艺术,全家人齐心协力把家营造得安全、自由、舒适、温馨。家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不设防的地方,不管你是穷是富,都要好好经营自己的家,要用心生活。只要脚踏实地努力生活,把小日子过好,什么样的至暗时刻都可以过去。”

路艳霞



人物名片: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祖籍浙江慈溪,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艺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一百个人的十年》,短篇小说《俗世奇人》等,现任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